从万润南回忆录看周恩来、林彪和胡锦涛

芦笛

老万的回忆录当真结棍，越写越精彩了。他说得很对，别的事有人七张八嘴，而他计划中的３００篇回忆录可不是别人能写出来的。遗憾的是，诸位天天呆在政坛里看烂帖子，却不知道光临汗衫去看那千金难买的过来人的历史见证。此所以我要特地把这帖子贴到此坛来，算是为老万打个广告吧。

最近那两篇，我反复看了几遍，感觉就是小诚那个：这网络的发明真好。如果没有中文网，就算是老万写出回忆录来，那也只会登在杂志上，不可能如同当面对话似的，有什么疑难立刻就能当面质询，而且还能看到各种各样你绝对想不到的反应。

例如然然跟老万的对话，就再生动不过地反映出阅历截然不同的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老万这家伙真不得了，全中国的名人要人他都有过来往，然然说的是汗衫的无名小卒小熊，他却以为人家问的是刘宁一的儿子，发现误会后，他才意识到然然可能根本不知道刘宁一是谁。然然还要问：刘宁一是林彪集团的么？哎哎，笑死我了！

不过笑归笑，我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除了知道刘在文革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好像负责外交，经常上报之外，对此人也确实没什么了解，文革中此人似乎就消失了，倒有点像陈云。区别是陈云后来重返政治中心，而刘再没露面，大概是死了吧。这中文网上，从玉皇大帝刘少奇开始直到刘宁一那样的巨灵神都知道的人，大概也就只有老万一个人吧。

爱你喂，写点零星感慨吧。

二战期间的英国王牌间谍波波夫在回忆录里声称自己的记忆力是照相式的，不论是场景，是文字，是事件，他都不但能记住主要情节，而且连细节都历历在目，还全是永久性记忆，因此反而给自己的间谍工作带来了麻烦——他是两面间谍，于是编造假情报欺骗纳粹情报机关时，难题反而在于如何忘记他知道的真实情况，云云。

这种本事，老芦不但没有，而且无法想象。不过，恐怕世上还真是有这种同志吧。周恩来的记忆力大概也属于此类。据说斯大林也有这个本事。

记得文革前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说周恩来去参加纪念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30周年的集会，立刻就认出了某个当年参加起义的老工人，不但叫出了他的名字，而且说出了两人的见面过程。而那人不过在几十年前，在周到达现场发动起义之时，把他领到工人纠察队总部去而已，那老工人后来就安分守己过小日子去了，并未参加革命，两人一辈子也就只打过那么一次交道，他记住和周恩来见面的全过程的全部细节毫不足奇，周能记住就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当时根本不相信。

不过，根据老万的回忆，周恩来只是听了汇报，便能历历如数家珍一般把清华发生

的事说得清清楚楚，看来周的记忆力确实不同凡响。文革中我看中央首长接见各地两派的讲话，能随口叫出地方两大派头头名字来的人，也就只有周一人而已。更何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周恩来佩服得了不的，因为后者在谈判时竟然什么资料都不带，桌上就放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是凭嘴说出来。

所以，周的杰出才干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正是周的可恨与可悲之处。

须知老周不比老毛那个土豹子，青年时代就到过东西洋，知道天不止一个井大。有无这见识完全不同，不信看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那上面说老邓当年去法国坐的邮轮是五万吨级的，所以后来四人帮那群土豹子把国产万吨轮吹到天上去，他心里直冷笑。如果老邓没有吃过两天"法国棍子"（Frenchsticks，即法国面包，后来他还专门让驻法大使黄华给他往国内捎），后来也就决不会推行如此开明（当然是以土共标准）的改革开放。

其实那干人所谓"留法勤工俭学"，和如今那夥在唐人街非法打工的福建国际盲流也没什么区别，只跟中国人打堆，不但没有整合入主流社会中，就连法语都没学会。所以那阵子盛传周和某鬼女生了个私生子，我根本不相信——他又不是加人，知道洋妞屁股长的咋样？但即使是龟缩在唐人街里油印中文传单，毕竟也和只读线装书的大槐夜郎国君毛泽东有本质差别，没有那点最起码的世界知识，老邓就决不会说出"不要扛大旗，我们扛不动"的大实话来。

顺便说句题外话，老毛许多话常常是针对自己说的，无比准确，例如"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中说什么"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对同志搞突然袭击"，这些话应该作为他的墓志铭，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斥（安鸟）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等等，恰是对中国"反帝反修"的逼真写照。

正因为此，周绝对不会不知道毛那土包子治国是何等反动，会把国家引到什么深渊之中，也绝对不会看不出来毛的本事只在于搞阴谋诡计打天下，若论治国，随便弄个白痴上去都要比他强一万倍。如果周真的以国家民族为念，就该联合所有的人，把毛搞倒了，自己上去大展雄才，把国家从灾难中救出来。然而他却终生颤栗于那超级流氓的淫威之下，先意承旨，舔痔吮痈，无所不为，让江青那夥文盲加流氓骑在头上拉屎拉尿还大气不敢出，成了全中国最卑微的"男人"。老邓还敢对四人帮强项，甫上台就敢大刀阔斧推行"整顿"，他连那点胆气都没有。所以后来他在做手术前拉着老邓的手，承认对方比他行，我看完全是真心话。倒不是说老邓的才干超过了他，而是老邓更比他像个男子汉。

所以，老万回忆道，周恩来冒着大雨在清华给他们讲话，台下高呼"总理打伞！总理打伞"他都不为所动，感动得台下的群众热泪长流，我只觉得恶心——作戏作到这个地步，到底有什么必要？

人斯大林从来就不玩这套，终生没有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样效法西方政客，不带警卫就敢深入到群众中去。二战那种生死攸关的场合，甭说英王乔治及其老婆经常出现在轰炸后的废墟里鼓舞民心，就连希特勒都时时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而斯大林却是天下第一懦夫，从来没有访问过一次前线。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实在说不过

去，便在战争后期乘坐经过高度伪装的专列，悄没声儿地去了一次前线，不但没有接见任何士兵，就连高级军官都没召见，呆了一晚上又悄悄地回来了。除了负责警戒的内务部队，谁都不知道这一壮举。可他就有本事在给罗斯福的回电里吹嘘：因为最近我必须时时访问前线，所以回信晚了，很抱歉，云云。

饶是这样，人家还不是照样作人民领袖？要愚昧国家的人民爱戴你，先得让他们怕你。有哪个共党国家的"人民领袖"不是这么当上的？光是作"亲民"秀有什么鸟用？

听老万的意思，周这套似乎是唯一能与毛抗争的生存术。Maybe,maybenot。据说毛曾对四人帮说"反周必乱"，我不怎么相信，得看那具体意思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因为周深得民心，毛便无法搞掉他，则我看这过分抬举了民心的作用。还是那句话：如果民心真能决定政权存亡，则我党早在８９年就垮杆了，起码李鹏同志绝无可能寿终正寝，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不过文革后期周倒深得党心，成了老干部的领袖，毛如果真的说了那句话，我看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才有点道理。唯其如此，他才会成了毛的眼中钉。不过要说毛因此失去了搞掉周的勇气，我看也不见得。其实毛的雷霆已经打到周的头上了。前段为了出书，我大幅度修改了《试解林副统帅仓惶出逃之谜》，在其中补充了如下内容：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底，毛一度病危，昏迷过去，周立刻赶到毛身边。根据周恩来侄女周秉承转述周的卫士张树迎的回忆，当时情况如下：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按：指周恩来）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著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的确，没有什么比周这句话，更能说明他对毛生怕大权旁落之心是何等洞若观火。正因为熟知毛对可能夺权的接班人充满猜忌，而周千方百计要避开这致命的嫌疑，这才会在毛复苏之时，脱口说出这最能安慰毛的话。可惜无论周如何表白自己，毛都不会放心。随著林彪那挡风墙的倒塌，毛对周的迫害不久就开始了，并逐步升级，越演越烈。

林彪事件后，在周主持下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极左思潮"，但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在毛的干预下迅速变为"批极右"，此后又变成名为批林、其实针对他的"批林批孔"，而周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根据官方出版的《毛泽东传》，１９７３年夏，周对其妻表妹说，他也会连累他们的亲戚。

１９７３年７月４日，毛泽东开始明确地警告周，在批示中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熟悉毛共语言的人都能看出来，那不是毛真的指责周主持的政治局不抓大事，而是指责他周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间，基辛格访华。一次他求见周恩来，毛已经服了安眠药入睡，周未取得毛同意便接见了基辛格。后者提议为中国提供旨在防备苏联的核保护伞，周未置可否，说要请示毛之后才能答复。会谈后周立即向毛汇报。毛当时没说甚么，但过后以此为周的把柄，无限上纲，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说错了话，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有失中国人的尊严，犯了右倾错误，并命令政治局开会批周。

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周在家等候通知，叫去才去，开完立刻离开。就连周身边的人都察觉了危险，周的卫士张树迎对周的保健医说："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咱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与此同时，毛还把当初对付林彪那套使出来对付周。１９７３年１２月，他数次接见中央军委及相关负责人，说甚么：我还可以打几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在指责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之后再说这种话，"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的人究竟何所指，周就是再迟钝也不会猜不出来。他似乎也知道毛想把他整死。根据耿飙的回忆，1974 年初，周对他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

毛确实想把周害死。早在１９７２年５月，医疗专家们就已发现周患膀胱癌，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尽快动手术。毛却通过汪东兴下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致使检查治疗工作被耽误了整整９个月。直到次年３月间周恩来大量尿血后，才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毛还要通过汪东兴下令，只准医疗组作膀胱镜检查，不准作电灼手术。最后还是医疗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悄悄把癌变部分烧掉了，但已延误了病情。

１９７５年８月，毛发动批《水浒》，指责"宋江架空晁盖"，扬言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时能够或曾经"架空晁盖"的"宋江"，非周恩来莫属。至于"投降派"的罪名则是毛的最新发明，无论是对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没用过，当然不会是指那两人。根据周"在中美会谈中犯了右倾错误"的背景，不难猜出那是指谁。对已病入膏肓的周恩来，毛还如此狠毒地"痛打落水狗"，逼得只会奴颜媚骨作检查的周恩来第一次作出了绝望的抗议。根据《周恩来年谱》，他在进手术室前，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景如实报告毛泽东。】

所以，如果周不是非常及时地、完全必要地死了，一定会被毛的雷霆彻底粉碎，倘若真是那样，我看天下也不会大乱——枪杆子是干嘛吃的？"童怀周"不过是几个"绝对正义感"比较浓厚的臭老九而已，老干部则早就让毛拿捏得魂飞魄散了，自保尚且不暇，还顾得上别人？

奥兰多的读后感大概颇有代表意义，他小人家使用"好坏两分法"的国术，总结出什么"刘没心计，周有心计不使坏，毛有心计使坏"的结论来，据说那还是看了《晚年周恩来》的结果，那书竟然会引起这种反应，我可是做梦都想不出来。

这"使坏"到底是什么意思，老芦迟钝，还真无法理解，想必主持成立中共第一个特务组织、暗杀顾顺章全家不算"使坏"吧。或许杀阶级敌人、哪怕是人家无辜的满门良贱也是应该的，"使坏"只包括对付共干自家人。

可即使是使用这标准，周同志似乎也难以及格。他老人家的特点，乃是不主动发难整人，但一旦党内大规模狗咬狗开场，他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把赌注准确地押到那边去，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每一次他都要参加痛打落水狗，决不会"丧失立场"。

因为强调"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党乃是天下最无情最势利的绞肉机。昨天还是"亲密战友"，今天翻脸便是生死大仇。谁要不明白这点，请去看李雪峰同志的回忆录，其中对１９６６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搞掉彭罗陆杨的记述特别精彩：敬爱的彭真同志立刻就没人理睬了。正是这种无比残酷无情险恶的政治环境，反衬出了周难得的"人情味"。在那个毫无人性的土匪集群里，也只有他有那本事一面在会上跟着赢家痛打落水狗，过后又打电话或接电话，轻描淡写地宽慰两句受害人。

现代人很难想象挨整是什么滋味，那就是刹那间掉进了冰窟去，到处只见一片白眼，哪怕是贵为国家主席，冤枉挨整也是哭诉无门：打电话去给老毛，他是绝对不会接的，打给其他人也一样，谁都不会理睬你，谁都要显示高度的阶级觉悟，谁都要体现坚定的革命立场，而这乃是我党最关键的"绝对正义的第一原则"。

如果同志们能勉强想象出这种残酷的情景来，则不难理解习仲勋同志为何终生对周恩来感激涕零。习同志乃是陕北那个山头的，文革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按理说和周没多少渊源。文革前，陕北帮有人写了本小说《刘志丹》，康生当即向毛举报，说那是为高岗翻案的，毛作了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当即受到牵连，给打成了反党分子。他满怀冤屈，试图到处申诉，可无论给谁打电话，对方都不接，唯一例外就是周恩来。周其实也就是在电话上说了几句不痛不痒、貌似关心、但丝毫没有丧失革命立场的 P 话，而习就从此感激终生。那一点都不奇怪——反差实在太强烈了。

即使背景如此黑暗，周也并没有给衬托成什么夺目的亮点。刘少奇倒霉后，周还假惺惺地打电话给王光美，要她正确对待，可这并没妨碍他在刘的专案报告上批下同意处决的话。当然这也算不了什么。如果周还有点良心的话，那他就该意识到贺龙的性命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有迹象表明他的确天良并未彻底丧尽，贺龙平反后，周在他的追悼会上对着遗像三鞠躬。我想，如果他不是共产党人，恐怕要在灵前下跪。

须知贺龙原来是大土匪，完全是周把他罗致入党的，此后一直算是他的袍泽，受他

的庇护，两人的"革命情谊"非同寻常。因为贺龙"圣眷"颇隆，一度主管军委工作，引起林彪嫉恨。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了敬爱的林副要拔除的眼中钉。贺龙同志给三军造反派整得受不了，只好逃到周恩来家里去躲避。周硬着头皮接待了几天，最后还是把他以"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的名义，将他送到西山某地，随即就把他出卖给受林彪叶群操控的军队造反派了。不知道干出这种卖友的下作勾当来，算不算"使坏"？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众所周知，无庸置疑，长征期间，中央一分为二，伟大领袖毛主席带着几千人的陕甘支队到了陕北那个拉屎不生蛆的地方，而伟大领袖张主席带着几万人和许多中央委员包括敬爱的朱总司令反对逃跑主义，坚持在南方开创革命根据地。

这两家中央到底谁是正统还真不好说，须知张主席的声望和资历可是远远超过了毛：他是中共主要创建者，他不但承担了策划、组织、对外联络等实质性工作，也是党纲党章的主要起草人，陈独秀、李大钊之流连一大都没出席，是事后拉来的名人招牌，而与会的毛润之根本连马列主义是什么事都不知道，在会上很少说话，生怕露怯。此后张一直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我党历史上，他和柯庆施是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两个人。不仅如此，他是我党内唯一一位获得过列宁勋章的布尔什特。这就是为何后来他叛逃后，周前去游说他回归时，要亲口对他说"这个党是你建立起来的"，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陈述。

这就是毛为何要对斯诺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时刻"。的确，张不但声望出众，资历出众，而且不是王明那种只会背经典的书生。人家人多枪多，光是警卫骑的高头大马都让毛妒火中烧，为此怒斥自己的警卫员，不许那些衣破褴褛的叫花子们呆看那些马。

因此，到底是让穆罕默德走向大山，还是让大山走向穆罕默德，便成了红太阳是姓毛还是姓张的关键问题。而周恩来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共在长征开始时，电台给打坏了，就此和莫斯科失去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国际派常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从外蒙步行越境回国。在毛周的说服下，林同意假传圣旨，说莫斯科谴责张主席的分裂行为，不承认他的"伪中央"，要他取消中央称号，北上加入毛中央。

这完全是弥天大谎。上面已经说过，红军长征时就和莫斯科中断了联系，此后中共发生了什么事，什么遵义会议，什么会理会议等等，斯大林一点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分裂成了两个中央，之所以要派林育英回来就是要恢复联络，而林居然就能编造出那莫京圣旨来。

可奇怪的是张主席竟然会受骗上当。既然主子发话，奴才当然只能凛遵。列宁的建党原则就是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中共乃是绝对服从国际的支部。根据这个"第一原则"，张主席当然只好乖乖取消中央称号，率众北上。还没到中央，主力就在"宁夏战役"中给逼到了黄河以西去了，此后奉命西征，被老毛使用阴谋诡计，以军委名义胡乱指挥，借甘肃二马之手除去这只劲旅。张从此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听任毛的纵情羞辱了。

毛和林育英并无什么渊源，去游说林假传圣旨，主要靠的还是周。请问周这么干一下，最终导致张主席的数万人马丧身西域，算不算"使坏"？

那"刘少奇无心计"一说更是神来之笔。看来奥同志连起码的党史常识都没有。建议他赶快去买本高华先生的巨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恶补一番也还来得及。

其实早在那书出版前，我便在旧作里反复说过了：林副统帅的造神运动毫无原创性，完全是抄袭敬爱的刘主席那伟大的无产阶级老马屁家的旧作。没有刘主席及其干将彭真等人在４０年代初期"造日"（古有夸父逐日，今有少奇造日），则红太阳就算能升起来，也绝对不会有那么伤眼睛。什么"毛代表红区正确路线，刘代表白区正确路线"，甚至发明出"在王明路线的指导下，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百"的弥天大谎，算不算"无心计"？刘捧毛使得毛能把国际派打下去，自己作了二把手，而林捧毛使得毛能把刘打下去，自己作了二把手，这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少奇同志还有什么可委屈的？用佛家的话来说，那不过是"现世报"而已，如同曹魏篡汉，自己又被司马氏所篡一样。

老万盛赞周在八一八接见红卫兵时举动得体，竟然遭到昭昭若昏的质疑，说什么这种礼仪早该在我党内部排练熟了，林彪不至于举止失措。这不但反映了后生们对那段历史是何等陌生，而且反映了旺盛的阶级感情加上入骨的权势崇拜彻底蒙住了党朋们的眼睛，让他们连我党是怎么回事都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我党本来是端不上席面的大老粗文盲痞子党，当初在瑞金"开国"完全是草寇称王，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礼仪。谁想见老毛，哪怕他正在游龙戏凤之时也能推门进去。记得某高干回忆录中曾说毛和贺子珍与另外一对夫妇在长征途中竟然同处一室，各自为战，不亦乐乎。该高干的夫人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实在无法适应这种土匪生活方式，还被毛嘲笑了一通。共党领袖的早期集体照完全是一夥乌合的山大王，并不讲究排座次，随便乱站在一起，牛嘴朝东，马脸朝西，党魁并不一定站在最中央，甚至可以不在第一排。

毛开始摆起帝王架子来，乃是在延安后期的事，高华先生的巨著已经把那过程讲得清清楚楚了：随着红太阳升起，毛也搬到了枣园去，深居简出，警卫森严。他毕竟是草头天子出身，这套名堂其实是从苏联学来的。大特务康生把苏联那套照搬过来，从延安时代起便设置了专门为中央首长提供粮食蔬菜的农场，以及相应的内卫措施，包括预防有人在食品中下毒等等斯大林的绝活。到了后期，林彪同志等人从苏联回来，便开始效法苏联人民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称毛主席为"天才"，所有的人都改口称毛为"主席"，据说只有彭德怀一直没改旧习惯，仍然管老毛叫"老毛"。建"国"后便规定了毛进场前必须先奏《东方红》，于兹完成现代帝王的宗教仪典，与叔孙通为刘邦那暴发痞子制定朝仪辉映于后。

可笑的是毛还有本事在内部讲话中指斥孙中山独裁，说孙中山入场时，所有的人都得起立，云云。人家好歹还没剽窃陕北肉麻情歌，专门用来作当代帝王登场曲，通报大救星就要光临不是？

除了这封建朝仪之外，我党党魁似乎从未接受过文明世界的礼仪训练。青年时代喜欢演戏的周恩来风度出众，但那似乎是无师自通。少奇就一塌糊涂，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他在国庆宴会上发表演说，一边念讲稿，一边跟猪吃食一般咂嘴，清脆有声，颇符节律，跟练习器乐的人使用节拍器一般，让人说不出地难受。

老万在回忆录里讲到的周恩来特意在礼仪上突出毛林，其实许多人看新闻片时都注意到了，好总理本来就是特意做作，卖弄给大众看的，大家怎么还可能错过？先母丝毫不懂政治，可连她老人家都和我悄悄说："你看周总理自己退在后面一大截，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在前面，他可真谦虚。"后来我去串连，看了披露８届１１中全会内幕的大字报，才悟出周为何这么表演：中央首次设立了两主席制，只有一正一副两主席，他俩的地位与其他政治局常委划然而异，这在我党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周那么做深得毛的心思，无非是从礼仪上突出正副统帅与众不同的地位罢了。

林彪长期不参加国事活动，建"国"十几年多半是躲在家中养病，当然不熟悉这套朝仪。其实老万说的那事真算不了什么，最有趣的还是党的九大开幕式上，伟大领袖登场时，乐队高奏《东方红》，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伟大领袖一干人进入前排主席台各自的席位，站着向代表们招手鼓掌，历时很长。这过程中，林副想坐下去，已经低头弯腰曲腿快坐下了，扭头一看，毛还没坐下来，还在那儿站着鼓掌，他一想不对，迟迟疑疑地又站了起来，接着鼓掌，如是者起码四五次，直到毛总算坐下来了，他见状才赶快跟着坐下，那畏缩尴尬迟疑之状可掬，让人觉得又好笑，又鄙视，又怜悯。

相比之下，人民的好总理则一如既往地潇洒从容，他根本就不像林副那样扭头看毛，而是用眼睛的余光监视着毛的举动，于是便能不早不晚地和毛同步坐下，既不至于在毛坐下之先就大剌剌地坐下，又避免了在毛已经坐下后还站着出风头之嫌。

林副那欲坐不敢、欲立不甘的尴尬模样实在太显眼了，大概没逃过全国人民的注意，起码我的密友们全注意到了这点。记得我们讨论过这事，在笑话林副那畏缩胆怯迟疑模样之时，也盛赞好总理的乖觉，并琢磨他是怎么解决这技术难题的。有人不同意我提出的"余光监视说"，说周一样微笑着四顾会场，怎么个用余光监视法？我说：这有何难？只需站在毛的稍后方，自然不用看也知道毛什么时候想坐下来。林副不懂这小花招，站得太靠前了，所以不扭头就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动静。

可怜林彪到死也没学会这套，后来恰恰是栽在我党特有的这些恶心小把戏上。听参加过九届二中全会的某位老同志说，林彪在作那个为他引来灾难的讲话前心神不定，那天居然没戴毛主席像章，甚至竟然在伟大领袖就座前便坐下来，而且坐错了位子，占了伟大领袖的席位，伟大领袖要坐时才发现鹊巢鸠占，白了林一眼，什么也没说便坐了他的位子，林副还懵然不觉，开始讲话，于是招来大难。记得中央当时传达文件时也说过这事，不过说得没这么详细。文件还披露，林彪吃了大亏后总结了教训，说枪杆子们只会打仗，搞政治搞不赢笔杆子，还特地下了命令，规定以后再出席会议前必须互相检查戴上像章、带了语录本没有，文件因此指出林彪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完全是虚假的。这些传达内容想来老帮菜们都该记得吧。

相比之下，人民的好总理终生是玩这种小把戏的大师，令人不能不惊讶一个大国总理竟然怎么会如此执着地在这些鸡毛蒜皮的 P 事上下大功夫，花死力气。好总理大概是戴着"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死的，而那时随着林副倒台，像章早就从领导和百姓的胸前消失了，全国还在戴的人就只有他。

记得先母深为此动，对我说：总理真难得。过去大家一窝蜂赶时髦，戴的像章越来越大（当时最大的毛主席像章已经做到快有胸膛大了，到后来军人们干脆把伟大领袖的画像装在镜框里吊在脖子上，与"挂黑牌"形成阴阳两极），总理戴的是那个朴朴素素的"为人民服务"，后来谁都不戴了，他还照样在戴那个像章。这人对毛主席真是情长意长，云云。

可就是这些做作让我觉得特别恶心。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总算允许悼念好总理了，于是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尽是追怀文章。有篇报导说，好总理快要逝世前，还在病床上仔细收听广播，学习元旦社论和《词二首》（也就是《重上井冈山》和《不须放屁》），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唱《国际歌》，并对医护人员们说什么：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你们相信不相信？甚至还忍着晚期癌症的剧痛找来某同志问：云南锡矿的肺癌发病率有多高？你马上就去调查，立刻就走，云云。

如果这些报导是真的，那我只能说，这人控制自己的意志力当真到了非人类可以企及的境界，可惜这惊人的意志力全 TMD 花在这些一钱不值、于国计民生毫无补益的迷你秀上了。以我的小人之心来管窥蠡测，那"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表演，完全是针对毛的"投降派"的指控而来的，无非是怕人家以后在他脸上打叉叉，骂他是投降派而已。而那"肺癌调查"无非是表示他到死都和无产阶级心连心。一种政治制度竟然逼着才干超群的大国首相把心思花到这些烂事上去，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显赫高官，竟然给暴君逼到使出这种徒劳无益的小花招来苦心孤诣地维护自己的死后形像，令人不但觉得可悲，而且越想越骇然。

后毛共倒是不怎么讲那套封建帝王的朝仪了，可同样没有文明世界的礼仪训练，仍然是靠各人自己的天生风度，无师自通地表演。在这方面老邓倒颇具天资，记得１９７９年他访美，个子虽矮，那中山服套在身上如同童装，但举手投足间处处透出自信与气魄来。这自信的气度使他竟敢把西方腐败象征牛仔帽戴在头上，在访问美国那腐朽糜烂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党党魁中，此类壮举大概还是第一次吧。他那次访美确实是巨大成功，连卡特总统都恭维他说，他征服了美国百姓，下次竞选若和他联手，则一定大获全胜云云。

老赵的风度也不错，起码比起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有卖样多了。可惜后来的党魁就一塌糊涂。

敬爱的江总那维扬小才子真是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动不动就掏出梳子来梳头，动不动就突然中断与外宾的谈话，用英文背诵林肯演说，让对方莫明其妙，动不动就登台献艺，卖弄他那浪子燕青吹拉弹唱的子弟勾当。最混帐的还是，土耳其总统给他授勋章，他居然有本事一把抢过来自己戴上，让国际传媒口沫横飞、津津有味地议论了起码半个月。江总大概想让全世界知道自己和革命先辈不一样，并非文盲痞

子，乃是"知识分子"，所以动不动就背诵唐诗，和李鹏动不动就背诵托尔斯泰小说一样。我想他那大概是想效法拿破仑加冕时把王冠从教皇手中夺过来，自己戴上。可他就不想想他是不是拿破仑，而土耳其总统又是不是那个让老拿任情欺侮捏弄的教皇！如李大牙一样，他的错误是不知道"没有那个肚，别喝那碗醋"的市井常识。同样的事，征服世界的英雄做出来是豪迈，弱不禁风的病夫做出来则只能让人齿冷。

最恶心的，大概还是他老人家访美时把王老太太带上，那老太太土得掉渣，一看就知道是国棉 X 厂走出来的苦大仇深、憨厚朴实的文盲女工，更要命的是他为了卖弄自己的忠贞，竟然跟中国人搀扶亲娘一样搀扶着老婆，根本不知道西方的规矩是女人挽着男人端着的小公鸡翅膀。

小胡同志倒比敬爱的江总稳重得多，起码没那些轻佻卖弄，可惜行动还是难免要露出夹皮沟来历来。就这次王文怡搅局的白宫演说他小人家也露了怯，还没等散场便要走，让小布总统一把拽住，那镜头反复在各大电视台上播放，解说员开口闭口离不开"stiff"这个词，每次我脸上都要热辣辣的。

最没劲的还是中央带头表现殖民地买办心理和暴发户那触目奴性，大内高手们按照伊斯特伍德主演的总统保镖的烂电影提供的上帝模式，一丝不苟地加以忠实复制，跟在胡主席的轿车两边跑。这套在国内使用倒是不妨，出国访问还搞这套烂名堂，那就明摆着是对东道国的侮辱——不知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人家是否在长安街搞过这套？这场景同样让鬼子的各大电视台很放了一阵子，让人家再度口沫横飞、津津乐道地议论了好几天。

看到敬爱的领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出乖露丑，我不止一次对着电视痛骂："外交部礼宾司的人是干嘛吃的！为什么不事先训练那些土包子一下？真混帐！"但每次都要提醒自己：在咱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没人敢去教育伟大领袖们。所以，大家别无选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江总自以为风流儒雅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没人教育也倒罢了，可以理解——谁也没吃豹子胆去给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最令人想不通的乃是不要脸的"知识分子"们还要拿粗鲁当英勇、以恶毒为机智，竟然无耻吹捧大牙外长李肇星代表全国人民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丑。

记得上次老跛在坛子里给我作了个链接，因打开进去看了一眼，乃是国内网上的无耻文人们捧屁舔臀，歌颂李外长唇枪舌剑如何锋利的烂"文章"。据那烂文字说，记者们问李外长对日本申常的感想，他居高临下地傲慢地说，人家希望晋级，获得提升，这可以理解也值得同情（非原话，大意而已），我当时看了就几乎昏倒在地。

这种话只能从两种人嘴里说出来，一是大金或大元派往大宋的使节，诸如羞辱文天祥的伯颜，那毫不足怪，人家是占尽上风的野蛮人，爱怎么侮辱你怯懦的南蛮子，你也只有忍气吞声；二是专门在网上打架的网霸如芦某，这倒是必备功夫，说话越损，越能巧妙恶毒地羞辱对方，便越能达到吓阻对方的自卫目的。但如果所谓"折冲樽俎"就是这么回事，那这外交部长未免也就太好做了些，随便哪个工厂农村里找个泼妇去都比他更结棍。

中国本是东亚病夫，处处要仰承东西洋鬼子鼻息，若想维持共党统治就更是如此。如果是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那当然节骨眼上决不能含糊。可 TMD 谁曾见过这种超级痞子，毫无必要、毫无来由，不过是为了逞个人口舌之快，卖弄自己的"民族气节"和满腹"机智"，就放肆地轻佻地侮辱重要邻国，招致人家报复，让中国的实际利益因这种痞子秀受到重大损害，敢问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祸国外交部长么？

李痞子丢尽千年礼仪之邦的脸还不打紧，最令人气短的是国人竟然愚昧到连好歹都不分了，竟然把这种下作痞子行为当成大智大勇加以歌颂！当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咱们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可惜要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似乎也不是那么回事。当年国府的外交使节，没一个不是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口若悬河、头脑清楚、风度翩翩的学者，胡适、蒋延黻、顾维均等人不必说，就连后起之秀也不寻常。记得国民党下台前，《中央日报国际版》上曾登过国府前驻联合国大使的回忆文章，那大使姓胡，名字记不住了。

他说，他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时，国府大势已去，台湾国微言轻，谁也不拿台湾来的大使当回事，因此他发言时下面乱烘烘的，谁也没注意，但他一开口就吸引了全场注意。他说："IamDrHu.Youmayask:'WhoisHu？'"顿时全场大笑。

歪？人家在这儿玩了非常机智风趣的英文文字游戏。他的演说如果翻译成中文就失去了这种效果，那意思是"我是胡博士（芦按：或胡先生，记不住了），你们可能会问：'谁是胡？'"，但英文里的"谁"的发音恰好是"胡"，于是听上去便变成了"我是谁博士，你们可能会问：'谁是谁'？"须知鬼子专门出这种题为《谁是谁（Whoiswho）》的书，其中收集了名人的简历介绍。因此，"谁是谁"早已经成了个英文成语，而这位胡大使正因为学贯中西，才能在国运维艰、国微言轻之时利用个人才智、幽默和学养赢得外交官的好感，以此改善了祖国的国际形像。这才是外交的正道。

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之后，恐怕还得加一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已发表的老万回忆录最精彩的一篇，我个人觉得是《我的学长胡锦涛》，它难得地给大众提供了今上微时的素描。

看了那篇文字，消极贤甥来劲了，得意洋洋地质问："老舅，看见了木有？"过去我和他就锦涛同志的来历争论过，因为小胡到时未毕业，我猜他是上了研究生，而消极不知道文革前就有研究生，说胡迟迟未能毕业是因为清华学制长，结果其实最后谁也没猜对：我不知道清华兴用学生作政治辅导员，而他把清华的学制想得太长了。

由此可见我高估了小胡在学术上的智力（≠"与人奋斗"的本事。国人的一大毛病就是永远要把这两者混在一起，死也不懂阴谋大师并不一定就是天才），但低估了他政治上的精明。

国内实行的那套干部遴选制度，大概谁都知道吧，那就是"积极分子制度"。从小学开始，当局就有意识地把学生按"忠诚度"划分为不同等级，所谓"积极分子"就是传统的"忠臣"，其实是宠臣，主要是奸臣（或曰佞臣），极少部分是真正的忠臣。这些同志如同英国作家奥威尔在《动物农场》里描写的独裁暴君猪猡"拿破仑"豢养的猎犬一样，不但是当局布在民间的耳目（监视百姓的特务的别称），更是我党实行"提纲挈领"式统治的骨干力量，如同树木的枝干脉络一样，维持了从树冠直至树叶的形状。随着年龄增大，这些人也一级级升上去，最后从老师的乖孩子甜团团直抵九五之尊。锦涛同志就是个鲜活榜样。

这就是老万转述的蒋南翔对清华入学新生们训话的精神实质：文革前能进清华的，当然只会是积极分子，当然要在未来的党国中成为栋梁。可见小胡同志是何等不凡：在清华那富集了全国积极分子的左派大本营中，他还能出人头地，变成积极分子中的积极分子，这份动心忍性的能力就决非寻常。

在文革前要当上积极分子，讲究的是"又红又专"，或曰"品学兼优"，用老万的话来说是"听话出活"，所谓"听话"也就是"红"或"品"，而"出活"则是"专"或"学"。"听话"是"决定矛盾性质的主要方面"，而"出活"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政治挂帅"的伟大真理，也就是"听话决定穷通显微，吉凶祸福"。

这套在文革前倒是简便易行，因为中央只有一个声音，可文革来了，大麻烦也就来了，旦夕之间，中央分裂为两个司令部，这"听话"到底听谁的？正因为"政治挂帅"，听话决定一切，所以一旦判断错误，转眼就是牢狱之灾；而判断正确就能指日飞升。听了正确的话，您就是"最最热爱，最最忠诚"；听了错误的话，您就是"奴隶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驯服工具"。

因此，文革其实是对积极分子们政治洞察力和自制力的最严峻的考验，对我等落后分子而言反而是坐山观狗咬的难得假日。

积极分子们的反应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死心塌地做"老保"，誓死捍卫旧主子，因而被造反派的铁拳砸得五痨七伤；第二种就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改换门庭，抛弃旧主投新主，诸如什么聂元梓、蒯大富（其实蒯大富在文革前就作为贫下中农子弟上大学的样板上过《人民画报》，在当时也算风头人物，老万大概忘记了），顿时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如韩爱晶同志一样，至今尚在缅怀他和毛主席"共同策划决定国家和世界命运的大事"；第三种则是深知凶险，隐忍不发，采取 lowprofile。

在这三种选择中，作出第一种选择的同志在文革中吃了苦头，虽然老干部复辟后再度得志，但毕竟宦途蹭蹬了好几年。第二种倒是备极富贵，以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速度直达"权力最高峰"，用老邓的话来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坐火箭上来的"。可这也正是他们的祸根所在——人家出生入死打下来的天下，岂容尔等排众而前，坐火箭上去？所以后来无不粉身碎骨，其升上去与跌下来的速度基本相等，而到达的高度与为时的短暂同样惊人。第三种才是真正精明的选择，那就是敬爱的胡总走过的路。

我原来猜想，锦涛同志文革中肯定是铁杆老保，看了老万回忆录才知，他远比这聪明多了，其实并非夺目鲜红，而是暗红色的，那就是基调是老保，但并不抛头露面，取温和态度，避免在尘埃落定之时卷入无比凶险的"大是大非之争"中，局势不明时作微观的"听话派"，避免宏观上的表态，局势明朗了再在宏观上旗帜鲜明地亮出旗号来，此所谓"老子平常儿骑墙"。

从这点上来说，他非常像周恩来，同样具有超凡入圣的自制力，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喜怒不形于色。上次连战和他会谈，台湾记者就观察到了他那惊人的自制力，说他一直保持了聚精会神听取对方讲话的模样，那专注的姿势竟然很长时间就没变一下，云云。

不过，那记者没提到也不可能看出来，胡主席这超人的耐心，只是对他力有所不逮、心有所欲求的对象才会使出来。和周恩来一样，他该忠诚时无限忠诚，该残酷无情时则决不心慈手软。周恩来可以在江青召开的针对他的"批林批孔"大会上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但文革中针对造反派的最大冤狱"清查五一六"也是他炮制的。同理，胡主席在上台前无论对什么个人冒犯都不计较，但镇压西藏"动乱"时则决不含糊——他当然有足够勇气，无论我党怎么四分五裂，在这种事上是决不会有争论的。在这种有惊无险的场合，不显示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何待？

正因为不懂博大精深的党文化，香港记者们才会在自作多情后碰了一鼻子灰。敬爱的胡总还不是总、只是国家主席之时，在海外记者团中人望甚高。和傲慢的李鹏、李大牙辈比起来自不用说，就连比刘晓庆刘歪嘴，他也是难得的谦谦君子。在路过香港时，登机前他常常微笑着向记者们道歉："这次时间太短，来不及和你们细谈了，请原谅阿！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谈！"可到了江总引退，他小人家熬成婆婆时，对记者团立刻就冷若冰霜，害得香港报人如蔡咏梅女士（不敢保证是否记对了）大叹"一阔脸就变"。

这在我看来就是小胡能爬上去的秘诀，这道理正如当初好总理在文革后期变成了老干部共同拥戴的精神领袖一般：在我党那种无比险恶的生态环境中，"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绝对是真理，只有锋芒深敛，让竞争各方都不觉得自己是威胁，才有可能作为各方都能接受也都需要的缓冲人物被推出来。

从老万的回忆录里，不难看出胡同志这门政治艺术功夫修练到了何等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作贵州省委书记时，办公室极度简朴，但老万走时他却送了两瓶茅台。这到底是因为他重情念旧，还是出于广结善缘的长线投资？我看后者更可能：老万那时毕竟是手眼通天之辈，谁也不知道后来老赵会翻船不是？

不过，敬爱的胡总和人民的好总理有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他终于熬成了婆婆，而好总理却不得不戴着伟大领袖的像章凄凄惨惨地死去了，为后人留下了个永远无法确凿解决的悬念：如果好总理在与毛的长寿比赛中熬了过来，他会怎样做？是比老邓更出色，还是令人大失所望，不过是庸主一个？

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答案，总觉得其实好总理运气真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地死去了，而且死得很凄惨，具备了足够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使得他在全党全军全国

人民心目中成了完美的圣人。如果他 outlived 伟大领袖，反倒要破坏那完美形像，正如玛丽莲·梦露死得其时，永远成了个不朽的性感肉弹一般。若想知道周执政是什么样子，看看小超就知道了，人说"对象对象，越对越像"，"对象"数十年，邓大姐岂有不像周阿哥之理？

在这点上，我觉得敬爱的胡总也非常像好总理，注定只会是庸主一个。这不是说他不会整人，据国内来的同志说，他终于转正后，立刻就显示了辣手，做翻了几位方面大员，而是官僚资产阶级树大根深，根本不是他可以动摇毫末的。这些废话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这次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很不幸，胡总并非老邓、老江那种没有信念的机会主义者，而是有相当坚定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

胡平同志继承孔夫子善恶两分法的优良传统，用"具有绝对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和"犬儒"取代了古已有之"君子"与"小人"。为了歌颂"理想主义"，他甚至不惜把毛泽东那种走火入魔的浪漫主义者也要打成"犬儒"，绝对无法相信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道德品质极度败坏的人可以同时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种幼稚直线思维很有代表性，它充分体现了国产"知识分子"那种泾渭分明的世界观，无法像西方同行（哪怕是俄罗斯同行也罢）那样去把握复杂多变的真实人性。

其实我早就说了无数次了，如果毛只是个张戎（她也是善恶两分法大师）笔下的阴谋家，那中国就有福了。吊诡的是，毛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犯，恰在于他固执地要以"善"毁国，而他毕生追求的"善"就是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平等"，除了他本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任何人不得享受特权。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确实是真诚相信中共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勤务员的，虽然坚定的信念并不妨碍他实行双重标准，更不妨碍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阴谋家。这道理丝毫不难明白：他和胡平一样，都相信"世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是大道理管着的"，胡平的近作不过是把这话重新表述为"一个用来衡量和判定各种原则轻重先后顺序的""第一原则"罢了。在毛看来，只要符合他那"解放人民"的"绝对正义"，便干出什么肮脏勾当来也无损于他的绝对道德立场。

正因为此，中国需要的政客恰好是老邓、老江那种没有什么执着信念、奉行实用主义的政客。不幸的是，敬爱的胡总恰好不是这种人物，始终是一个信念相当明确坚定的政工干部，其精神世界的框架早就在５０年代铸定了。从内心理念来说，他更认同毛而不认同邓。

所以，老万在胡转正伊始处理萨斯案时燃起了无限希望，乃是因为不明白胡主席是怎么回事：那不过是他出自于毛的"亲民"信念，和朝拜西柏坡的举动完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老万一厢情愿地心动。

毛和胡的共同认识误区，是以为共产党在执政后还能是"人民勤务员"，而不是压迫剥削人民的奴隶主。因为缺乏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没有在世界框架上通过比较去认识中华文明的机会，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看到：要这么作，共党就不能是终身领导者，就只能作随时随地可以被人民解雇的临时工。只有白痴，才会天真到以为一个非但无法解雇、而且不能指责、只能听话服从的领导者可以同时是"人民的勤务员"。

说起来，这正是胡总的致命缺点：因为是暗红色老保，始终处于安全地带，他不曾像知青一样从社会底层打滚上来。如果他有过我等的遭遇，就不难看出毛的空中楼阁是何等荒唐：文革中，所有的同志都是奴隶，但服务行业的奴隶们同时又是众人的主子。见识过售货员、公车驾售员的晚娘脸的同志都知道，那些人乃是大众当仁不让的主子。其所以如此，乃是众人都有求于他们，而众人都奈何不了他们。无论是受了何等虐待，都得受人家拿捏，顶撞她们只有自己吃亏的。

唯一能对付那些刁妇恶婆的只有小芦那种顽劣分子。那时我若在柜台前受了窝囊气，立刻就是铺天盖地一通恶骂，用匪夷所思的脏话把对方砸懵了。趁她还没反应过来，我便一道烟溜之乎也，她反正在柜台里，又不能出来追我，于是便失去了还击机会，只能在那儿越想越气。此后我便永远不再上那家商店去，让她一辈子也无法出那口气。

可就连这种病态地"行使当家作主权利"，那前提也是有其他的商店供我选择。如果全城就那家商店，那我就只有乖乖接受售货员蹂躏的份儿，让对方侮辱死了也不敢回嘴。

反过来，后来我回国去，服务人员的态度都非常好，跟西方的也差不多了，那并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而是因为她们再不是终身雇员了，随时有被炒的危险，得罪顾客就可能招致这种灾难。而老板之所以会因为顾客抗议惩罚售货员，并不是他毛著学得特别好，用得特别活，乃是他有求于顾客，更必须在严峻的竞争中求生。

哪怕是从这个市井例子中，也能看出西方民主的设计原理来：要逼近"领导并非统治者而是人民的勤务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使得统治者对人民有所求，有所忌惮，能随时被百姓炒了；反过来，人民必须具有选择其他政治势力作领袖的自由，这才不会使得执政党如同当年的国营商店一样，"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你不买是你自己倒霉。

可惜毛到死也不明白这些市井常识，这才会在建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天堂"来之后，痛苦地发现那其实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天堂，与人民没多少相干。他解决一切难题的手段只有一个：暴力革命，于是便认定"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据说是控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这结果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毁党造党，毁国建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小胡虽然可能在手段上对文革的极端行为有所保留，但他的心其实是和毛主席相通的，不信请诸位去看老邢转贴来的香港《争鸣》杂志披露的胡的近期讲话。我个人认为那可靠性很高，《争鸣》记者大概认识国内的高干子弟，消息非常灵通而且准确。早在１９８８年，记者罗冰就在《北行放语》专栏中披露了老赵地位不稳的消息，六四后我把那些旧杂志刨出来重读，发现那些预言惊人地准确。所以，个人认为同志们应该仔细学习那通过非常途径传达的中央首长讲话。

根据那讲话，胡主席似乎再度作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６０年代的发现，那就是伟大祖国已经变色了（他用的术语似乎是"变质"），我们的干部们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做官当老爷（他用的术语是"统治者"）。既然如此，那逻辑结论当

然是毛式"反修防修"。

可惜敬爱的胡总没意识到，他小人家根本不该说这些话。毛和刘的根本分歧，乃是在１９６４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２３条"时明显化的。刘不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提法，用他的话来说是"一提'派'，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因此得罪了毛，使得毛终于下了决心搞掉刘。两人脑袋在这上头都很清醒，都认识到了毛继续革命的对象再不是传统阶级敌人而是党本身，所以刘要挺身而出卫党，而毛则下定决心毁党，最后毛虽然整死了刘和一大批老干部，但毕竟败给了树大根深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尸骨未寒就不但妻离子散，而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噩梦果然成真，"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连老毛那创业英主都奈何不了那个多头凶龙，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儿童团长胡锦涛又有什么能耐？说这些大而无当的 P 话，除了得罪既得利益集团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

更何况论气质，小胡同志乃是最不适合领导咱们进行新长征的人选。上面已经说了，他小人家的长处和好总理一样，都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在强势方眼中显得格外听话，但具有这种气质的同志精于风险计算，喜欢立于安全之地，缺乏毛邓那种不顾一切带头搞革命的强悍的光棍魄力。所以，我吃准了他顶多只能有雷无雨地嚷嚷几声，最后顶多只能落实到毫无抵抗力的文化界头上去，让随着他上台而变得万籁俱寂的文化界更加沉寂，他自己却死不会意识到，越是去捏那些软柿子，越是去割除人民抱怨叫苦的喉舌，则中共从统治者变为"人民勤务员"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总而言之，愚以为，"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岁月功"，从周到胡，都不过是中国整个走错了路的悲剧时代出的悲剧人物，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如果中国真有可能实行民主化（已经说过了，这还有待于咱们摸着石头过河去亲身验证，并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结果），那在我看来也得等到今天这些"小犬"们执了国柄罢。

【全文完】